從萬隆到福爾摩沙：海外台獨運動的未竟之夢

作者：鄭文琦，艾爾凡（Irfan Muhammad）*

摘要

《萬隆幻見：從陳智雄、廖文毅到全球南方》是一個以海外台灣民族自決運動和萬隆（亞非）會議作為雙重背景的創作前研究計畫，試圖從台灣、印尼、馬來西亞等不同觀點來理解這個冷戰時期象徵亞非團結的重要會議，以探討在「全球南方」的當代脈絡中，不同歷史敘事與認同如何得以重新闡述。在台灣的部分，計劃追溯戰後在東京推動台獨運動的廖文毅和戰後滯留印尼的陳智雄，兩者在萬隆會議出席問題和會後的（不）交會軌跡，藉由檢驗他們之於台灣民族自決運動的位置，試圖提出不同於既有文獻的觀點，而在 70 年後重新思考萬隆精神的視域。

主流的萬隆會議敘事通常追溯至 1954 年在錫蘭可倫坡舉行的會議，當時緬甸、錫蘭、印度、印尼與巴基斯坦的領袖齊聚一堂，促成了 1955 年 4 月亞非會議的召開。當時被歸類為親美陣營的台灣並未受邀與會。根據會議秘書長的回憶錄，台灣的缺席所反映的並非中立的程序性決定，而是特定（緬甸、印度）政治領袖的立場所致。此一發展發生於國民黨政權內外交迫之際：對外有第一次台海危機，對內則是白色恐怖的統治加劇，於是美國的介入則再次確認了其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本報告以「共作」的方式處理台灣海外台灣民族自決運動與印尼媒體檔案呈現的多元觀點，特別是關於台灣缺席萬隆會議的複雜歷史，其中冷戰背景關鍵性地影響各國對二戰所遺留福爾摩沙問題的態度。論述特別關注於萬隆會議後廖文毅所領導的台灣民族自決運動，由臨時議會到台灣共和國建立的過程。本計畫最終將後萬隆網絡中的台灣共和國視為一條不結盟的、台灣共和國試圖為未實現台灣民族於後殖民脈絡下擘建的「第三條路」。

關鍵字：萬隆（亞非）會議、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不結盟運動（NAM）、後萬隆

*本報告主要撰寫者為鄭文琦。內文中若使用「我」而非「我們」，僅代表鄭文琦個人之觀點或感想，本報告全部內容亦由本人負責。

一、前言（動機）

《萬隆幻見：從陳智雄、廖文毅到全球南方》是一個以海外台灣民族自決運動和萬隆（亞非）會議作為雙重背景的創作前研究計畫（按：1955 年召開第一屆亞非會議後，原擬於開羅召開第二屆亞非會議；底下指史實時簡稱「萬隆會議」，指架構時稱「亞非會議」），試圖通過台灣、印尼、馬來西亞等不同觀點來理解這個冷戰時期象徵亞非團結的重要場合，以探討在「全球南方」的新語境下，不同歷史敘事與認同如何重新闡述。在台灣的部份，本報告以共作方式追溯戰後在東京推動台灣獨立的廖文毅，和滯留印尼並在 1958 年受聘為台灣共和國東南亞特使的陳智雄，兩位在萬隆會議出席問題上的（不）交會，提出不同於既有文獻的觀點或推論，進而在 70 年後重新思考萬隆精神的視域。報告將分成前言（研究架構、研究對象、文獻回顧）、背景與框架、研究方法與新發現，台灣共和國的再討論、結論等節論述。

1. 研究架構

本計劃發起人兼研究員鄭文琦為獨立藝文工作者，研究領域為跨文化比較研究。曾在 2017 年發起「群島資料庫」計畫並於 2019、2025 年兩度造訪萬隆亞非會議博物館。2025 年於綠島人權藝術節跟 Posak Jodian、Angga Cipta 合作〈環形時間展示館〉以台灣民主獨立黨主席廖文毅五〇年代在東京發行的《臺灣民報》為雛形創作《火燒民報》[1]，開始注意到現有文獻對於廖文毅及其委任東南亞特使的陳智雄是否參與 1955 年萬隆會議，有諸多矛盾說法。[2]其中，於後者又大多強調陳智雄的悲劇英雄性格。合作研究員是印尼籍的艾爾凡（Irfan Muhammad），研究領域為音樂中的文化政治。[3]來台後接觸台灣獨立音樂領域，開始意識到台灣國族認同與文化、藝術領域之間的複雜糾葛。本研究希望借重其語言與檔案專長解讀印尼文獻，並以共做方式完成報告。

除了上述兩位研究員，本計畫亦邀請印尼、馬來西亞藝術工作者於 3 月 14、15 日假鳳甲美術館和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舉辦工作坊（第一天「研究成果發表會」、第二天「『剪與救援』絹印版畫工作坊）。[4]第一天專題演講講者為馬來西亞蘇丹伊德里斯大學魏月萍博士，講題為：〈喚見南方：萬隆會議思想與文化遺產再思考〉；第一

[1] 參見《2025 綠島人權藝術季：一四九海浬的時間：對抗遺忘》展覽手冊，或【2025 綠島人權藝術季｜創作紀實】（群島資料庫）。來源：https://www.instagram.com/reel/DMkYzHpy6FC/（2026.04.01 瀏覽）

[2] 相關討論參見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訪談，《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蔡晏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福爾摩沙在萬隆：亞洲第三世界國族主義的歷史與未來」（計畫編號：MOST 106-2420-H-009-006-；2017.06.01～2019.05.31）；蘇瑤崇，〈外交謀殺——論「臺獨烈士」陳智雄案〉，《國史館館刊》第 75 期（2023.03）；頁 141-188。

[3] 其著作包括：*Bandung Pop Darlings: Notes on Two Decades of the Bandung Indie Pop Scene (1995–2015)*（2019）以及多本獨立出版小誌。曾參與包括 2024 年台北雙年展《你見過道明寺嗎》；2024 年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藝術節與李嘉霓共同策展《Jalan Balik：Paulus Supomo〈Senikanji〉的身分之旅》，以及 2024 年台北立方計劃空間的《搖滾印尼：萬隆的滾石文化殘響》策展。來源：https://thecubespace.com/project/rocking_indonesia/（2026.04.01 瀏覽）

[4] 參見：「萬隆幻見」研究成果發表會（第一天），「鳳甲美術館」官網。來源：https://hong-gah.org.tw/hong-gah/bandung-fantasized_ch（2026.04.01 瀏覽）

場報告人為鄭文琦、艾爾凡，題目為：〈從萬隆到臺灣：海外台灣民族運動的未竟之夢〉；第二場報告人為印尼藝術團體「剪與救援」（Annga Cipta、Syaiful Ardianto 代表出席），題目為：〈在壓力中的平衡之道：以互相尊重促成主權團結〉（由吳庭寬翻譯印尼文；兩人亦負責隔天的絹印工作坊）。相關活動紀錄參見結案報告附件之 YouTube 影音、照片、小誌檔案等紀錄，本文不再贅述。

1. 問題意識

本計畫原訂子題為：一、「萬隆會議」的迷思及其再生產；二、戰後國族認同與「台灣共和國」思想網路：以廖文毅為中心；三、「全球南方」與「福爾摩沙主義」的互動：以陳智雄為案例。但因為史料中廖文毅與陳智雄的數量比重太不對等[5]，故本文全面整合為更具體的問題意識：**圍繞著廖文毅、陳智雄出席萬隆會議的迷思與再生產，從「萬隆會議」到「台灣共和國」的思想承襲脈絡（並先釐清萬隆會議網絡及其相關之「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等後萬隆概念之差異）**。更精確地說，通過描繪廖文毅、陳智雄和亞非會議的影響脈絡與思想互動關係，本文試圖「以冷戰為背景、以萬隆會議為框架」，並扣問：**台灣、印尼互為主體性的萬隆會議歷史，如何通過廖文毅、陳智雄等人的行動路徑，提供我等重新思考全球南方論述的方法？**

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涉及的歷史人物繁多，但最主要的對象為廖文毅與陳智雄，其他是贊成或反對在萬隆（亞非）會議架構納入福爾摩沙問題的相關政治領袖。為使讀者能快速掌握內容，本文先就各方涉入萬隆會議的脈絡予以敘明。

2-1. 廖文毅（英文：Thomas Liao Wen-yi；1910-1986）

廖氏出身西螺望族，在家中排行老三。日治時期赴中國求學，隨後又留美取得化學工程博士。1936 年擔任浙江大學系主任等職。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曾指派他任台北市政府公職。而他對新局也有所期待，曾於戰後發行《前鋒》政論雜誌並於 1946 年投入國民參政院選舉。但因做票而落敗，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他的立場頂多是「聯省自治」[6]，但事件發生時他正好與二哥赴上海並遭指控為首謀，隨後黃紀男遊說當時去香港的廖文毅擔任台獨運動領袖。[7]受到二哥廖文奎（1905-1952）影響，二二八事件後立場從美國託管派轉向獨立。

廖氏從萬隆會議返回東京後，1955 年 9 月成立臨時議會，1956 年 2 月成立

[5] 國家檔案局雖然有陳智雄卷宗（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案名：逆陳成龍（智雄）），但史料來源過於單一。國外史料也只有他 1958 年宣傳台獨被捕的報導。
[6]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頁13-22。
[7] 黃昭堂，〈日本的台獨運動〉，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自覺與認同——1950～1990 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5）；頁51。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8]但 1965 年 5月14日違背自己追求獨立的宣示，在當局保證「釋放獄中親友」及「返還所有財產」等前提下返台。[9]此決定讓他淪為國民黨宣傳樣板，也象徵海外台獨運動的挫敗。儘管如此，他推動的台獨運動在冷戰時期曾令蔣氏政權芒刺在背，傾全力予以分化。雖然台獨社群因其背叛而評價不一，但隨著史料解密逐漸肯定其海外運動成就。2024 年 8月20 日吳叡人在中研院台史所「台灣獨立、永久中立與不結盟：廖文毅的全球南方之路」演講中提及廖文毅等人的建國綱領《臺灣民本主義》（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令我興起一探究竟的念頭。

2-2. **陳智雄**（化名「陳成龍」；英文：Tan Tih Hiong 或 S. L. Tan；1916-1963）

陳智雄戰前留日並精通英語、馬來語等，據說在戰時被派往馬來亞任通譯，曾「協助」印尼戰後獨立，戰後留在印尼經商。1958 年春至日本商談時，受廖文毅之邀出任臺灣共和國駐東南亞特使；但 6 月 6 日在雅加達宣傳台獨後，遭當局以「美國間諜」罪名逮捕並於 1959 年 6 月 7 日驅逐出境。之後想入境日本卻因無簽證而遭拒絕，遂轉往瑞士取得臨時護照並於 8 月 16 日以短期簽證入境。後因簽證逾期，在國民黨外交運作下同年 12 月 3 日遭日本逮捕。當時他並非中華民國國民且持有瑞士臨時護照，依國際法慣例應遣返瑞士，但日本卻將其遣送臺灣。起初政府於 12 月 30 日給予具保開釋，但 1962 年 1 月 22 日卻再次逮捕，最後於 1963 年 5 月 28 日藉「組織同心社意圖台獨叛亂」為由將其槍決。[10]

蘇瑤崇指出陳智雄是因台獨運動而遭槍決的烈士，也是自日本遣送回台的台獨人士中唯一遭槍決者，因此其壯烈事蹟也為人傳頌。但這些令人感動的事蹟有許多並非事實。[11]

2-3. Sir Kotelawala

在萬隆會議五發起國領袖中，只有錫蘭（今斯里蘭卡）總理 Sir Kotelawala 堅持納入福爾摩沙問題。其政治立場為自由主義。*Modern Diplomacy* 指出，Kotelawala 打亂尼赫魯原本欲向亞非領袖引介周恩來、並將會議框定為「反西方殖民主義」場域的意圖，更指蘇聯共產主義也是一種「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形式，暴露出與會國之間的意識形態裂痕並動搖原已脆弱的共識，因此「尼赫魯試圖建構一個包容中國的統一反殖前線的努力，受到一種更對稱的權力政治批判挑戰。此批判拒絕讓共產主義的擴張豁免於審視。」[12]

[8]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頁76-83。
[9] 李世傑，《大統領廖文毅》（台北：自由時代，1988）；頁292。
[10] 本段綜合以下文獻：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頁103，125-130。蘇瑤崇，〈外交謀殺——論「臺獨烈士」陳智雄案〉，《國史館館刊》第 75 期（2023.3）；頁 141-188。
[11] 蘇瑤崇，〈外交謀殺——論「臺獨烈士」陳智雄案〉，頁 141。
[12] Amarasinghe, Punsara , “Our Man in Bandung: How Sir John Kotelawala of Ceylon shocked Nehru’s idealism”,

Sir Kotelawala 強調亞非國家應保持自主性而非盲目選邊站，亦認為西方內部與共產國家之間的外交經濟聯繫有助於推動全球的穩定發展，但具體改革方案需再考證。至於他在可倫坡會議中對二戰遺留的福爾摩沙歸屬問題提出建議，暗示台灣地位應交由聯合國託管、中華民國應將權力交還給台灣人，但當時建議是基於戰後初期的亞洲領袖關於東亞局勢的討論。雖然大會秘書處和相關文獻裡確有其「**新殖民主義**」指控引發周恩來抗議的紀錄，被視為支持台灣民族自決之聲[13]，但缺乏充分證據顯示他明確支持台灣獨立方案。

2-4. **周恩來**（Zhou En Lai 或 Chou En lai；1898-1976）

周恩來是與毛澤東齊名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家領導人。1949 年新中國建立後長期擔任總理，不過在萬隆會議結束，直到 1958 年間便遭毛澤東批鬥。雖然不算是主要研究對象，但許多台灣左翼學者談到與第三世界的思想淵源時都會提到他。惟他之所以能出席是因 1954 年底五個發起國領袖於茂物會議上，尼赫魯提議邀請中國，巴基斯坦總理 Muhammad Ali 原擬拒邀中國導致緬甸總理 U Nu 不滿，揚言若巴基斯坦拒邀中國或邀台灣，便將退出萬隆會議籌備；這也間接導致台灣、兩韓及蒙古等與中國地緣接壤的「邊界案例」皆未受邀與會。[14]

3. 文獻回顧

探討廖文毅、陳智雄海外台獨運動的專書或論文並不多，而同時提到兩者的專論通常以廖文毅為主，僅有部分文獻提到陳智雄，這也本研究主要限制。其中，陳慶立的《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是廖文毅研究中最完整呈現他轉向台獨的外在軌跡，但對他如何受到二哥廖文奎的影響論述則較缺乏；相對來說，吳叡人對廖文奎著墨甚早，參見吳叡人、吳冠緯主編的《廖文奎文獻選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1）。[15]《大統領廖文毅》（台北：自由時代，1988）作者李世傑為昔日策反台獨組織的調查局探員，深知許多滲透活動內情。後來因調查局內鬥而成白恐階

Modern Diplomacy, 2020.05.20. Source: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0/05/15/our-man-in-bandung-how-sir-john-kotelawala-of-ceylon-shocked-nehrus-idealism/, 2026.04.04. accessed

[13] 吳叡人，〈愛國者之書：《台灣民本主義》中譯本序言〉；收錄於：廖文毅著，陳儀深、葉亭葶主編，龔昭勳、葉亭葶譯；葉亭葶、何義麟審訂，《台灣民本主義》（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頁 52-53。

[14] Abdulgani, Roeslan, *The Bandung Connection—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1st published by Penerbit Gunung Agung, 1980; 2nd published by Museum of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2020; pp. 36-37.

[15] 1931 年廖文奎以 *Morality versus Legality: Historical Analyse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 取得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博士學位，並於 1933 年由英國出版社以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 之名出版，其思想為廖文毅的《台灣民本主義》奠定基礎。吳叡人，〈祖國的辯證：廖文奎（1905-1952）台灣民族主義思想初探〉，《思與言》第 37 卷第 3 期（1999.9）；頁 51-52。後收錄於收錄於吳叡人、吳冠緯編，《廖文奎文獻選輯》（台大出版中心，2021）；頁 383-434。吳叡人對廖文奎的興趣源於兩人都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哲學思想博士，前者受後者激勵進而生對民族思想的追尋之心。吳叡人，〈歷史與哲學之間——芝加哥，還有學長廖文奎教給我的事情〉，收錄於《廖文奎文獻選輯》。頁 1-9。

下囚並出版此書。唯該書雖有參考價值，在學術上卻未必客觀。陳佳宏的《海外台獨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是海外台獨論述代表作，但幾乎沒有提到陳智雄。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 《自覺與認同——1950～1990 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2005）和《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2009）兩本都收錄不少論文，幫助我們釐清以東京為據點的台灣民族自決運動如何在國共夾殺中走出一條血路。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的口述史《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訪談因廖文毅案入罪的廖史豪、黃紀男、許昭榮等，有助於掌握前輩對廖文毅行動的觀點。[16]有趣的是，雖然張炎憲在該書〈總論〉中寫道萬隆會議召開時，廖文毅致函大會，並由印尼首相宣讀信中蔣政權非法佔領及台灣獨立訴求，但並未確認廖是否與會[17]；而黃紀男則直指廖曾經與會。[18]

在專文或論文方面， 吳叡人的《台灣民本主義》導論〈愛國者之書：《台灣民本主義》中譯本序言〉[19]為本計畫初期參考文獻，但對陳智雄的記述也似乎有待釐清。劉佳旻的〈域界之間：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以 1945 年後半至 1947 年初的報刊空間為例〉[20]啟發我藉《前鋒》、《台灣民報》等刊物考察戰後台灣菁英的思想轉向。蘇瑤崇的〈外交謀殺——論「臺獨烈士」陳智雄案〉則是唯一一篇詳細釐清陳智雄從被印尼驅逐出境、到被台灣情治與日本外交單位聯合遣送回國的過程，與蔡晏霖科技部計畫「福爾摩沙在萬隆：亞洲第三世界國族主義的歷史與未來」（計畫編號：MOST 106-2420-H-009-006-）報告並列為本文最重要的文獻依據。

除了中文文獻，本文參考的原文文獻大多圍繞萬隆會議相關主題。底下便依據主題相關度順序來介紹。五〇年代台灣民主獨立黨成員簡文介的《台灣の独立》提及廖文毅等人參與會議的經歷，主要內容是戲劇化地呈現錫蘭總理 Sir Kotelawala 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的衝突。[21]Dr H. Roeslan Abdulgani 的 *The Bandung Connection—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第 5 章和第 14 章都有「台灣問題」在萬隆會議上的討論；而第 14 章「The Sri Lanka Prime Minister Explodes a Bomb—And the Compromise over the Term “Colonialism”」提及對「新植民主義」一詞妥協，即簡文介回憶錄提及錫蘭總理對蘇聯「新殖民主義」暗示之不同說法。[22]Homer A, Jack 的 *Bandung: On the S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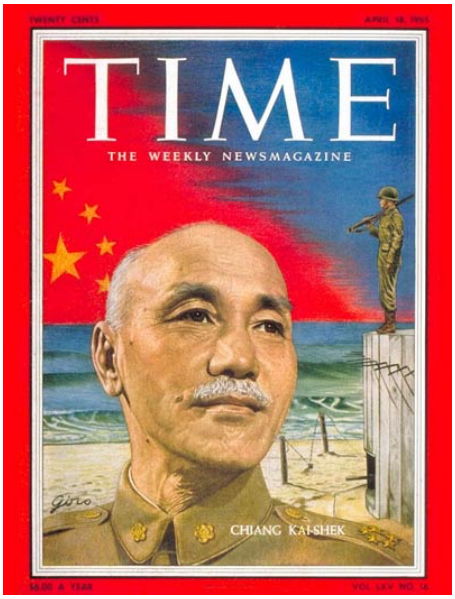
---

[16]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訪談，《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
[17] 張炎憲，〈總論〉；收錄於：張炎憲等訪談，《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頁 9-10。
[18] 「廖文毅……1955 年並以（台灣民主獨立黨）黨主席身份獲邀出席在印尼萬隆舉辦的『萬隆會議』，使得他的國際聲望達到最高點。」〈黃紀男〉，張炎憲等訪談，《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頁 121-122。
[19] 吳叡人，〈愛國者之書：《台灣民本主義》中譯本序言〉；頁 37-56。
[20] 劉佳旻（2010），〈域界之間：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以 1945 年後半至 1947 年初的報刊空間為例〉，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1] 簡文介，《台灣の独立》（東京：有紀書房，1962），頁 104-109。
[22] Dr H. Roeslan Abdulgani (時任亞非會議秘書長)，*The Bandung Connection—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First published by Penerbit Gunung Agung, 1980; second published by Museum of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2020。其中，斯里蘭卡當時國名應為錫蘭。

Description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也是接近原始的文獻。[23]Darwis Khudorim 收錄於萬隆會議 60 年紀念 *BANDUNG AT 60: New Insights and Emerging Forces* 的"Bandung Conference: The Fundamental Books"是吳叡人引用錫蘭總理支持將台灣交聯合國託管之說的出處。[24]Eric D. Pullin 的"The Bandung Conference: Ideological conflict and the limitation of US propaganda"[25]則為讀者勾勒萬隆會議當下的冷戰意識形態衝突圖像。

上述專文或論文除了 Eric D. Pullin 的文章以外，幾乎皆偏左翼觀點或提及錫蘭總理和中國總理的衝突。雖然很少看到從台灣或其他未出席國家的立場出發的文獻（畢竟有許多國家如馬來亞當時也尚未獨立），海外歷史學者 Tang Tsou（鄒讜）的"The embroilment over Quemoy: Mao, Chiang and Dull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6]卻是難得從美國的視角闡述台海危機，支持了蔡晏霖主張「**缺席的在場**」這樣一種台灣因素影響萬隆會議的觀點。雖然本文無法詳列出所有參考文獻，如陳勇健的《灼見名家》專欄文章對台灣共和國的彙整[27]，或印尼媒體的相關報導，本研究仍多少列入參考。

二、以冷戰為背景，以萬隆會議為框架



1955 年 4 月 18 日萬隆亞非會議開幕當天，美國《時代雜誌》以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1887～1975）為封面人物（附圖），凸顯的是與萬隆會議的反殖民、反帝國訴求完全不同的政治訊息。當時台灣在歷經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到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的不確定階段，在中國內戰失利的蔣氏政權已在台灣站穩腳步。與此同時，中國結束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將關注轉向懸而未決的台灣離島。正是在戰後秩序大致底定、朝鮮半島爆發戰事（1950-1953）的前提下，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成了與美國結盟對抗共產勢力的冷戰前線代表。而我們也得以在此背景下，重新想像緬甸、錫蘭、印度、印尼與巴基斯坦等新興國家在 1955 年發起萬隆會議的動機。

在進入史料考證與新發現等討論之前，本節先以萬隆會議為框架，分別從中國民

[23] Homer A, Jack, *Bandung: On the Spot Description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1955; Chicago: Toward Freedom, 1988.
[24] Darwis Khudorim, "Bandung Conference: The Fundamental Books," in BANDUNG AT 60: New Insights and Emerging Forces.Jogja, PUSTAKA PELAJAR. Pp. 3-33.吳叡人在〈愛國者之書〉文中引用此書。
[25] Eric D. Pulli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Ideological conflict and the limitation of US propaganda," in Sandra Bott, Jussi M. Hanhimaki, Janick Marina Schaufelbuehl and Marco Wyss ed. *Neutrality and Neutralism in the Global Cold War: Between or within the blocs*?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52-71。
[26]Tsou, Tang. " The embroilment over Quemoy: Mao, Chiang and Dull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Utah, 1959. Pp. 7-9.
[27] 陳勇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戰後台灣的一段歷史〉，《灼見名家》，2015.08.11。來源：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2509（2026.4.1 瀏覽）本文也將相關媒體報導皆納入補充文獻。

國之於台灣內部的合法性（包括「台灣地位未定論」）、萬隆會議前的第一次台海危機、萬隆會議後的印尼華人認同等三方面來勾勒主題輪廓。

1. 從「遷佔者國家論」到「台灣地位未定論」（1945 之後）

近代的台灣始終是東亞地緣上的特殊存在。《戰後臺灣政治史》作者若林正丈指出，歷史上的臺灣先後成為清國、日本和美國之帝國邊陲，使不同移民移入而形成多重族群社會，並在經歷多次社會重組後成為後來「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前提。1949 年後臺灣作為「國家」，既是自由陣營與共產陣營之間冷戰的前哨基地，自我宣稱正統的自由「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28]，也是相對於台灣內部社會的「遷占者國家」，這正是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初期條件」；而這所謂正統中國與遷占者國家的性質，使得 1947 年二二八事件所導致的「省籍矛盾」固定下來，具現為不平等的「**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29]

以廖文毅為首的台灣民族自決運動，是在 1947 年廖文奎、廖文毅兄弟飛到香港、1950 年廖文毅落腳東京以後，逐漸形成一套日後海外台獨運動採用的「台灣定位未定論」作為鼓吹建立真正代表台灣人的國家主權主張。雖然「中華民國派」屢屢援引「開羅宣言」，指出其聲稱「**滿洲、福爾摩沙及澎湖列島等領土應歸還中華民國**」，1945 年「波茨坦宣言」亦重申「開羅宣言」的條款將予以實施。然而，這些戰時聲明並非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即使正式國際文件如《舊金山和約》，也未對戰後台灣法律地位作出明確界定。[30]在這樣的認知下，《台灣民本主義》指出台灣人對《開羅宣言》抱持極大疑問[31]——雖然追溯思想源頭，最早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人可能不是廖文毅而是**廖文奎**。無論如何，在二二八事件後，廖氏兄弟從國際法得角度質疑《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的法律效力，並在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作為建構台灣主權的主張。[32]換言之，台灣民族自決思想並非突然出現，而是在戰後流亡知識分子的思考中逐漸成形，並在廖文奎過世後由廖文毅繼續實踐，形成 1956 年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權依據。

2. 萬隆會議前的「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1954~1955）

---

[28] 因此，這時的英文媒體也常常以「國民黨臺灣（Nationalist Taiwan）」或「共產中國（Communist China）」來分別指稱冷戰期間兩個同樣延續自內戰的對立政權。

[29] 「**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即外來外省籍政治菁英占據中央層級的優越地位，而地方政治菁英主要為本省人。廖文毅在中央觀點只能算地方政治菁英。蕭阿勤為《戰後台灣政治史》所寫的〈導讀〉。引自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台灣政治史》電子書（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

[30] 關於《舊金山合約》與戰後 1952 年後台灣地位的相關討論，參見：薛化元，〈從歷史文獻看台灣國際的定位問題〉，「台灣國際地位研討會」（2009.11.21）；頁 90-100。

[31] 廖文毅著，龔昭勳、葉亭葶譯；葉亭葶、何義麟審訂；《台灣民本主義》。頁161-169。

[32] 葉亭葶，〈廖文毅《台灣民本主義》一書之誕生（1948-1957）〉，收錄於：廖文毅著，龔昭勳、葉亭葶譯；葉亭葶、何義麟審訂，《台灣民本主義》；頁35。薛化元亦指出：「**除了廖文奎（廖文毅兄）等少數人明白表示陳儀奉派接收台灣只是戰勝國的接收而不是台灣主權的移轉外，基本都在期待『祖國』接收。**」薛化元，〈從歷史文獻看台灣國際的定位問題〉；頁 93。

1954 年 9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要「解放」台灣而砲擊金門。美國政府為遏止對台攻擊，與國民黨政府締結防禦條約，並於 1955 年 2 月協助蔣介石自大陳島撤軍；而對金門、馬祖的政策刻意保持模糊。[33]1955 年 1 月 28 日美國國會通過由行政部門提出的聯合決議案，授權總統在其認為必要時，為確保台灣安全之特定目的動用美國武裝部隊。於是台灣正式納入美國冷戰防線，也使蔣介石在此時成為反共代表。面對美國介入對台灣離島的防衛，中國持續進行砲擊但未發動登陸作戰，顯示其「對勝利並無把握」——依照毛澤東避免在無勝算情況下作戰的原則——北京試圖在不損及自身聲譽的情況下結束第一次台海危機，同時思考如何在外交宣傳上取得突破。[34]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在萬隆會議取得了重大外交突破的中國總理周恩來，遂以「和平解放台灣」為籌碼，交易急欲拉攏中國的亞非各國不討論福爾摩沙歸屬問題。

3. 萬隆會議後的印尼國內政治脈絡（1956~1965）

從 1955 年的萬隆會議到 1961 年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簡稱 NAM）會議」期間[35]，蘇卡諾急欲在冷戰期間設法引進中國力量建立「雅加達—北京」軸線，而為中華民國（甚至遠在東京的海外台灣民族自決運動）外交帶來嚴峻的考驗。例如：蘇卡諾在 1965 年 5 月 23 日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簡稱 PKI）成立 45 週年群眾大會上的演說[36]裡如此宣示：



> 因此，CONEFO 匯聚了民族主義的反帝國主義國家、宗教的反帝國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在這些國家之中，都存在著進步力量。由此，我可以向那個十年的代表們說明，CONEFO 就是國際版的 NASAKOM[37]。

---

[33] 1955 年 1 月至 4 月的《蔣中正日記》中便記載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美方的互動。例如：1955 年 1 月 20 日「愛克（艾森豪將軍）建議我放棄大陳，彼美願以海、空軍掩護我撤退，甚費躊躇。（頁 23）」1955 年 2 月反省「美對撤防大陳與協防金、馬之約言失約食言之經過，實為上月初與本月初最大之難關，得此教訓，又於我對美外交多得一教訓矣，幸能堅持嚴責，仍得其書面之保證……七日開始撤防大陳，至十一日完成此一大事。（頁 61）」4 月份亦見對尼赫魯、周恩來參與萬隆會議的不滿。

[34] Tsou, Tang. " The embroilment over Quemoy: Mao, Chiang and Dulles," pp. 7-9.

[35] 有關不結盟運動會議的討論，參見：Prashad, Vijay,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pp. 95-105。

[36] Sukarno, "Subur, Subur, Suburlah PKI (讓印尼共產黨繁榮昌盛吧)," Sukarno's speech to the mass meeting of PKI on May 23, 1965.

[37] CONEFO 是 Conference of the New Emerging Forces（新興力量會議）的字首縮寫；即蘇卡諾在萬隆會議後提出的政治構想。NASAKOM 是 NASionalisme（民族主義）、Agama（宗教）、KOMunisme（共產主義）的字首縮寫，目的是在印尼國內把三種衝突力量整合在同一政治框架下（Irfan Muhammud）。

在這樣的秩序下，華裔印尼人被分裂為兩個陣營，反映出冷戰的國際格局及血緣情感。親國民黨的陣營因此在蘇卡諾政權下受到壓制，而與反對黨如 Masjumi（印尼穆斯林協商議會）、PSI（印尼社會黨）結成聯盟。親北京的華人則取得戰略地位，並與印尼共產黨結盟。我們看見親美華人報紙在關於萬隆會議的報導上，總是呈現如下語氣：「（關於萬隆會議）莫斯科一直利用他們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恐懼，試圖在他們與西方世界之間打入楔子。」[38]同時，左翼媒體如 *Harian Rakjat* 報紙大力指控國民黨及其華人黨羽根本是（亞洲）動盪的亂源[39]：「對人民的熱愛，不可能與對那些為帝國主義辯護、製造分裂的團體的熱愛相結合……例如 Masjumi 領袖 Daud Beureuh 發動叛亂並維護地主利益的行動，以及為國民黨集團辯護的 PSI，還有 Tjong Hun Nji[40]。」

基於這樣不利台灣的情勢，萬隆會議後就算還有同情台灣民族自決的海外華人，光是要撇清自己和國民黨（或被強迫代表的台灣人）沒有關聯都來不及了，遑論要爭取印尼或其他新興民族國家的同情。這或許是種下了 1958 年陳智雄為台灣共和國宣傳台獨之後，成為不受中國、印尼歡迎的人物而被逐出印尼（後被遣送回台）的遠因。

三、研究方法與新發現

在簡述作為背景的冷戰時序和萬隆會議作為框架以後，這節介紹研究方法與透過跨國合作獲得的新發現。本計畫標題的「幻見」一詞，靈感來自前行研究蘇瑤崇澄清傳說中的陳智雄事蹟（如曾赴萬隆會議）均非事實，網路上關於陳智雄（以任何身份）運作廖文毅參與萬隆會議的事蹟皆為傳言。因陳智雄在 1958 年才成為其東南亞特使，時序上亦不符合。基於史學方法的**外部**或**內部考證**（external criticism or internal criticism；前者是確認文獻或史料的正確性，後者是確認可靠或可用性），底下便就史料來源、台灣人參與萬隆會議的事證一一說明並提出推論。

1. 史料來源

在研究過程中，國內史料主要來自台灣大學圖書館、國史館或國家檔案館。國外史料則是印尼國家圖書館 PerpusNas（Perpustakaan Nasional 縮寫）和印尼國家檔案 ANRI（Arsip Nasional Republic of Indonesia）。與此同時，萬隆亞非會議博物館已將史料盡數轉移 ANRI，因此八月拜訪博物館並未有太大收穫。另外，我們也透過印尼夥伴取得不同的資料來源，如萬隆會議期間官方發行的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ulletin*[41]或

[38] 《Free China Review》，1955 年 6 月。
[39] 《Harian Rakjat》，1955 年 5 月 20 日。
[40] 此人名為舊式印尼拼音。但以讀音比對漢字可能是「章勳義」。參見：林平、林東余，〈打開黑盒子：冷戰時期的台灣與印尼關係發展（1949-1971）〉，《亞太研究論壇》第 68 期（2020.12）。頁 87-116；有「同（1953）年 9 月，印尼以『維護治安』之名，逮捕了朱昌東、**章勳義**等數名親台灣的印尼華人（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1：126）」這樣的文字。
[41]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ulletin* No, 1(Mar 1955), 2(Apr 1955), 3(18, Apr 1955), 4(19 Apr, 1955), 5(20, Apr 1955), 6(21, Apr 1955), 7(22, Apr 1955), 8(23, Apr 1955), 9,(24, Apr 1955), 10(Jun, Apr 195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Courtesy of Cut and Rescue.

美國解密檔案[42]，但國史館檔案均為手寫抄送，全部看完要花不少工夫，疏漏在所難免。蔡晏霖計畫報告則為考察陳智雄的海外活動補充部分拼圖，特別是釐清他 1945 年以前和 1959 年以後活動的史料（儘管在印尼期間仍缺乏文獻）。

2. 外部考證

雖然台灣被歸類在亞非新興國家所針對的美國陣營，而且尼赫魯邀請中國代表而間接使台灣未能受邀與會，但從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的日文報《內外タイムス》刊載亞非會議報導「日本平和宣言提案　台湾問題で論戦か」[43]，可知台灣問題（戰後的福爾摩沙歸屬）確實出現在議程中。底下先從廖文毅、陳智雄於 1955～1958 年間的外部史料，來考證他們出席萬隆會議的說法真偽。

2-1. 台灣人是否出席萬隆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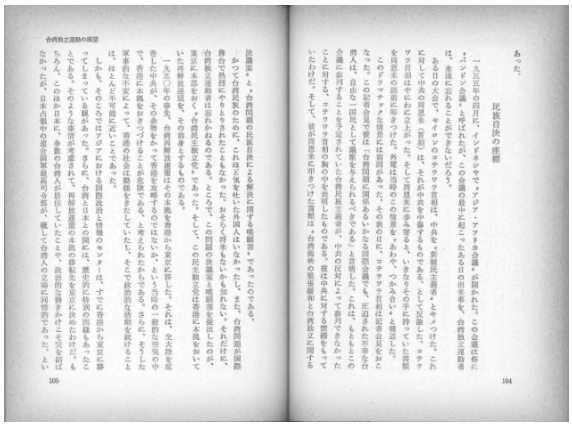
關於「廖文毅（在陳智雄協助下）出席萬隆會議」的說法，目前未見於亞非會議正式代表名單[44]或會議紀錄中。人們所知主要是出自台灣民族自決運動相關出版、白恐口述或後設揣測，而非國際外交體系的正式會議文件。換言之，此種說法本身帶有高度的運動性質，其史料需謹慎界定。

儘管缺乏官方文件證明，吳叡人卻在 2024 年 8 月 20 日中研院台史所的「台灣獨立、永久中立與不結盟：廖文毅的全球南方之路」演講中宣稱：陳智雄代表廖文毅出席萬隆會議[45]，這和他為《台灣民本主義》所寫的導讀〈愛國者之書〉觀點相當接近。[46]不過，〈愛國者之書〉引用來源包含簡文介的《台灣の独立》段落，並未如他所說提及陳智雄，而是談錫蘭總理與中國總理的爭執：

> （附圖）大會上，錫蘭總理科特拉瓦拉將中共稱為新殖民主義者，並主張其本質與帝國主義無異，因此加以批判。對此周恩來總理起而反駁，並走向科特拉瓦拉當場遞交文件，試圖以此澄清事實。當時外電報導此情景為「激烈的交鋒」。其實這場戲劇性場面事出有因。前一天，科特拉瓦拉在記者會上表示：台灣人應被允許以自由國民的身分出席會議。這意味原本預定由中共代表中國出席的安排，**因為有反共立場的台灣民主運動者無法列席而受到質疑。**
>
> 據報，他在記者會上明言：「與台灣問題相關的國際會議，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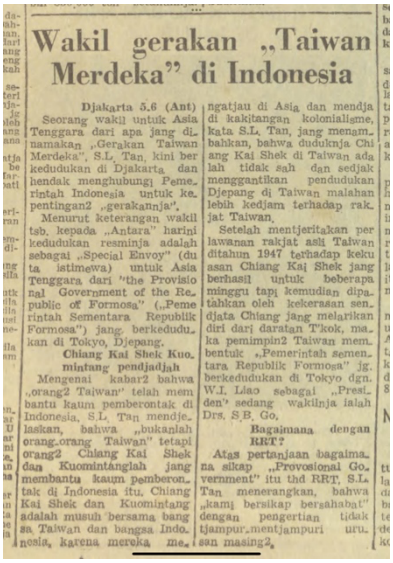
[42] Research Memorandum Ref-64 Nov 6, 1964, Subject: The Status of the Taiwanese Independence Movement; U. S. Department of State(美國國務院),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43] 「日本『平和宣言』提案　台湾問題で論戦か」，《內外タイムツス》，1955.04.22，頭版。
[44] 國防部第二廳，〈亞非會議之檢討〉，1955.06.21；國史館陳誠副總統文物／文件／外交與國際事務／國際參考資料 008-010602-00010-007。
[45] 僅有筆者未公開錄音檔可以證明。
[46] 吳叡人，〈愛國者之書：《台灣民本主義》中譯本序言〉；頁 53。

讓受到壓迫的不幸台灣人民，以自由國民身分出席。」這番言論自然引發了中共方面的不滿。周恩來之後遞交給他的文件，內容涉及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緩和及台灣獨立問題。也就是說，這場衝突並非單純的外交口角，而是直接觸及台灣問題與民族自決的核心。另一方面，關於**台灣問題以民族自決方式解決的決議案**，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提出。[47]



吳叡人引述的《台灣の独立》段落也沒有廖文毅與會身份的說明，而這段錫蘭總理與中國總理的「新植民主義」爭論，措辭與 Dr. H. Roeslan Abdulgani 在 *The Bandung Connection—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第 14 章[48]又有些不同，看得出前者刻意與錫蘭總理第一天挺台發言連結，以凸顯其對台灣的支持——此外其他情節則大致吻合，故推測《台灣の独立》仍有其可信度。

2-2. 陳智雄與廖文毅何時接頭？



Wakil gerakan „Taiwan Merdeka" di Indonesia

Djakarta 5.6 (Ant) Seorang wakil untuk Asia Tenggara dari apa jang dinamakan „Gerakan Taiwan Merdeka", S.L. Tan, kini berkedudukan di Djakarta dan hendak menghubungi Pemerintah Indonesia untuk kepentingan2 „gerakannja".

Menurut keterangan wakil tsb. kepada „Antara" harinji kedudukan resminja adalah sebagai „Special Envoy" (duta istimewa) untuk Asia Tenggara dari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 („Pemerintah Sementara Republik Formosa") jang berkedudukan di Tokyo, Djepang.

Chiang Kai Shek Kuo, mintang pendjadjah

Mengenai kabar2 bahwa „orang2 Taiwan" telah membantu kaum pemberontak di Indonesia, S.L. Tan mendjelaskan, bahwa „bukanlah orang-orang Taiwan" tetapi orang2 Chiang Kai Shek dan Kuomintanglah jang membantu kaum pemberontak di Indonesia itu. Chiang Kai Shek dan Kuomintang adalah musuh bersama bangsa Taiwan dan bangsa Indonesia, karena mereka mengtjau di Asia dan mendjadi kakitangan kolonialisme, kata S.L. Tan, jang menambahkan, bahwa duduknja Chiang Kai Shek di Taiwan adalah tidak sah dan sedjak menggantikan pendudukan Djepang di Taiwan malahan lebih kedjam terhadap rakjat Taiwan.

Setelah menjeritakan perlawanan rakjat asli Taiwan ditahun 1947 terhadap kekuasaan Chiang Kai Shek jang berhasil untuk beberapa minggu tapi kemudian dipatahkan oleh kekerasan sendjata Chiang jang melarikan diri dari daratan T'kok, maka pemimpin2 Taiwan membentuk „Pemerintah sementara Republik Formosa" jg. berkedudukan di Tokyo dgn. W.I. Liao sebagai „Presiden" sedang wakilnja ialah Drs. S.B. Go.

Bagaimana dengan RRT?

Atas pertanjaan bagaimana sikap „Provosional Government" itu thd RRT, S.L. Tan menerangkan, bahwa „kami bersikap bersahabat" dengan pengertian tidak tjampur-mentjampuri urusan masing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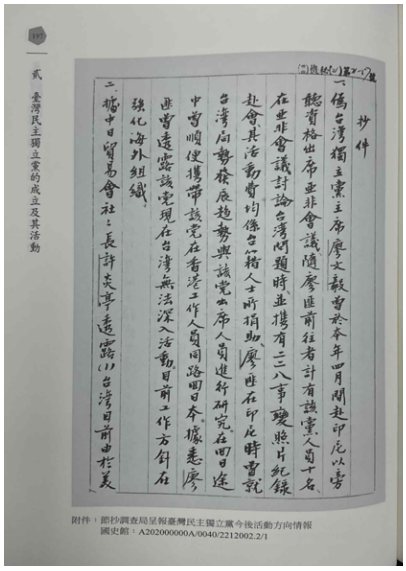
相對而言，陳智雄於 1958 年被任命為「台灣共和國東南亞特使」並於印尼活動的記錄，則散見可見於不同類型的史料來源，特別是印尼國家檔案局的 *Antara* 官方通訊社乃至印尼當地報紙 *Merdeka* 報導（附圖）。[49]而在〈陳智雄脫離台灣獨立運動之聲明〉（以下簡稱「脫黨聲明」）中稱陳第一次與廖文毅見面為 1958 年初，同時接受廖委任「駐東南亞特使」之職[50]（這些史料的前後背景也可參考陳慶立或蘇瑤崇的考證）[51]；蔡

[47] 簡文介，《台灣の独立》；頁 104。原文為日文，翻譯與粗體為筆者所為。
[48] Dr H.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The Sri Lanka Prime Minister Explodes a Bomb—And the Compromise over the Term "Colonialism"; pp. 113-114.
[49] Merdeka，1958 年 6 月 6 日「（標題）『台灣獨立運動』在印尼的代表：（雅加達 6 月 5 日安塔拉社）一名自稱『台灣獨立運動』東南亞代表的 S. L. Tan 目前駐在雅加達並打算與印尼政府接洽，以推動其運動相關事務。該代表向安塔拉通訊社表示，其正式身分是「福爾摩沙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東南亞特使。該臨時政府設於日本東京。」鄭文琦節譯；檔案提供：Syaiful Ardianto；PerpusNas 館藏。
[50] 外交部移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案名：逆陳成龍（智雄），1959，頁 145-153。
[51]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頁 103，125-130。蘇瑤崇，〈外交謀殺——論「臺獨烈士」陳智雄案〉；頁 150。

晏霖的科技部研究顯示，陳智雄 1958 年 6 月被捕時所持為中華民國過期護照，而非網路謠傳的印尼公民文件。儘管這些史料都需要考證其生產脈絡以釐清意義（如國安檔案反映的是國家監控或鎮壓的視角，運動紀錄則可能有政治動員或宣傳目的）。但可以確認，沒任何文件能證明陳智雄在 1955 年即代表或運作廖文毅與會。

3. 內部考證

當我們在外部考證的基礎上，進一步以內部考證原則檢視相關敘事時，不難發現台灣民族自決運動的歷史建構敘事，往往將 1955 年的萬隆會議與 1956 年的台灣共和國串連起來，作為後者獲得國際認可之佐證。此種敘事未必反映歷史行動者當下的實際經驗，而更可能是事後在「不結盟國家」或「全球南方」（吳叡人、蔡晏霖語）後設的詮釋。然而，從外部質疑史料的可信度時，卻也可能標準太嚴格而忽略其中或許有歷史際遇成分。例如：蘇瑤崇在檢驗陳智雄參與萬隆會議的說法時連帶否認廖文毅與會的可能性，並稱「在外交部的檔案中，雖詳細記錄了廖文毅的活動，包括下述參加馬來西亞獨立慶典，或埃及召開的亞非會議，但卻完全沒有他參加萬隆會議之紀錄」。[52]可是沒有受邀與會，並不代表他不能自己去旁聽。根據《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廖文毅案史料彙編》「行政院長俞鴻鈞送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節抄調查局呈報臺灣民主黨今後活動方向情報」（1955.07.18），廖文毅以「**旁聽**」資格出席萬隆會議，這也是截至目前為止，廖文毅曾去萬隆最直接的證據。這份手抄檔案轉錄如下：


抄件
一、偽台灣獨立黨主席廖文毅曾於本年四月間赴印尼以旁聽資格出席亞非會議、隨廖匪前往者計有該黨人員十名、在亞非會議討論台灣問題時、並攜帶二二八事變照片紀錄赴會、其活動費均系台籍人士所捐助、廖匪在印尼時就台灣局勢發展趨勢與該黨出席人員進行研究、在回日途中曾順便攜帶該黨在香港工作人員同路回日本、據悉廖匪曾透露該黨現在台灣無法深入活動、目前工作方針在強化海外組織。
二、據中日貿易會社社長許炎亭透露（1）台灣目前由於美援中國不能以實力解放台灣、故企圖利用政治方式、使國民政府自然消滅、英國與印度所主張將台灣交由國際託管這一提議與中共對台灣的政略同出一徹（2）台灣問題的發
附件：節抄調查局呈報臺灣民主獨立黨今後活動方向情報
國史館，A202000000A/0040/2212002.2/1

[52] 蘇瑤崇，〈外交謀殺——論「臺獨烈士」陳智雄案〉；頁 150。

> 展其結局必為國際託管、屆時國民政府自然消滅、以台灣獨立黨的主張對英印兩國的提案頗為滿意、今後該黨之運動方向當以此為發展與努力
> （3）台灣獨立黨基於此一情勢、現正密令海外所有黨員努力希望與英印兩國政府正式提出將台灣交由國際託管時、做有力之響應與促進、將向英國及關係國家進行請願或有實現可能。[53]

我曾請教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史的蘇瑞鏘、何義麟兩位教授，咸認這份史料出自海外線民的可能性極高，但他們無法論斷其內容真實性。不過，從史料內容中至少可看見 1955 年台灣民主獨立黨參與萬隆會議的主張和動機，即宣傳戰後蔣氏政權在台灣的惡行（二二八事件）與尋求國際支持，大致上吻合萬隆會議後 1955 年 9 月東京組成臨時國民議會與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之發展。雖然現實中印度欲拉攏中國，是否真如第二點所說支持託管尚須查證（周恩來在萬隆提出「和平解放台灣」而反對託管）。但第一點無疑加強了廖文毅、簡文介曾與會的可信度。

通過上述外部、內部考證，我們認為萬隆會議之於我等理解廖文毅、陳智雄五〇年代的行動而言，並不只是單純歷史事件，而是必須放在弱小民族共同體藉以獲得「政治象徵資本」的**能動性**來理解。因此，千方百計想參加亞非會議的廖文毅，和三年後受命宣傳台獨的陳智雄，肯定也參與了這個（以萬隆為起點的）歷史動員進程。

四、台灣共和國的再討論（以下暫不公開）

[53] 「行政院長俞鴻鈞送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節抄調查局呈報臺灣民主黨今後活動方向情報」，1955.07.18，國史館（檔案編號：A202000000A/0040/2212002.2/1）；收錄於《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廖文毅案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2025）；頁 197-199。